

十大文学畸人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


十大文学畸人



825.6
C632

陈允吉主编·上海古籍出版社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
十大文学畸人



陈允吉 主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十大文学畸人
陈允吉 主编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十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7.5 插页 5 字数 116,000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

ISBN 7-5325-0669-X

I·397 定价：2.90元

前 言

《十大文学畸人》向读者展示阮籍等十位作家的生平事迹、思想性格以及文学活动的情况。这些作家构成了一个群体家族，分别生活于从中古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，可以说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，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亦不尽相同。如若取其大端，则基本上都是一些未能见容于当世的狷介疏检之士，思想和行为背俗反常，即古人所谓的与世道时尚不耦之“畸人”者也，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却有无可争辩的地位。我们就把他们统称为“文学畸人”，在搜集材料和剖析较多作品的基础上写成了这本小书，目的是想让读者于光华缭乱的古代文学现象中，从一个较为特殊的方

面增加一些感性认识。

人们的意念活动和艺术创造，是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心理结构中进行的，它们总是在极明显的程度上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。延续于华夏大地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到处弥漫着沉闷窒息的气氛，这是萌生众多畸形病态人格的温床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畸零人何啻百千，本书只收入了极小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人物，取舍亦未必完全恰当。这里面有阮籍、嵇康这样蔑视礼法、乖异人伦的名士，也有孟郊、李贺、贾岛等一批生活漩流里的不幸沉沦者。在唐寅、徐渭身上体现着明代部分南方士人任情放诞的生活风度，金圣叹和郑板桥不同的结局同样是清代高压政策下发生的悲剧。最后一位苏曼殊称得上是勇敢的斗士，与此同时他的致命缺陷也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。他们异口同声地呼唤着人性的觉醒，自己的性格则远没有达到完美的境地，感情与理智经常失去平衡，要说容易招致物议的地方实在太多。然而我们不能忽略，这些作家的才华确实是令人惊叹的，夸诞和愤世嫉俗的议论亦不乏智慧的闪光，至于在文学艺术领域里，更是无一例外地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。这个领域一直被认为是正统儒士牢固把持的圣地，但真正的成就却时常属于那些迹近异端的浪子。文学史上已

有不少事例证明，某些作家的艺术创造力往往得力于他们的反常性格，长时期的精神压抑有可能促使他们更专笃地致力于艺术上的追求。譬如孟郊这样一位标榜道德高古的诗人，实际上他的精神世界充满着积郁，其创作灵感有一些就是来源于幽闭在他灵魂深处的潜意识。尽管这些人和现代人生活的距离已很遥远，但从历史的眼光看仍不失是卓犖的一群，我们要对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，做些介绍和研究就显得颇有必要。

这本书不是完整的人物传记，也不属于作家作品的评论性著作，说得客观切实一点，恐怕仅仅是对有关人物做了一番轮廓式的描述，所用的线条是相当粗略的。鉴于十人情况各异，文稿又出于不同执笔者之手，文章的写法、结构和语言风格不能也不应完全一致，不过参与这项工作的所有同志，对于“文学畸人”这一题目都怀有极大兴趣，因此在接受上海古籍出版社交附的任务后，总觉得需要想些办法，使这本书写出自己的特色。并且经过大家的切磋讨论，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想法。这主要是试图通过有关作家生平事迹与文学作品精神面貌的叙述，注意去揭示发生在他们内心世界的剧烈矛盾冲突，尽我们的可能多发掘一些作家的变态心理和潜在意念，以便能够带

动读者去领略和体察一下这群畸人的心灵生活。也许这些纯粹是我们的主观愿望，要使上述想法在全书当中得到体现，真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。囿于我们这些撰稿者的水平和识力，本书疏陋和浅尝辄止之处一定很多，企待广大读者阅后多赐教言。

参加本书编写的十位同志，都是在高校中文系工作的中、青年教师，各自在本单位担负着繁重的教学、科研任务，书稿的撰写只能利用一些间隙时间进行。《十大文学畸人》现在得以出版和读者见面，应该归功于全体执笔者的共同努力，虽然我们只是完成了一本篇幅极其有限的书稿，但在这过程中大家所得到的启益却弥足珍贵。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国章、赵昌平等同志，曾先后给予我们不少工作上的帮助，趁在前言中略说几句的机会，亦顺提一笔表示我们的谢忱。

陈允吉

一九八八年十月七日

目 录

1	前 言	陈允吉
1	阮 籍	骆玉明
25	嵇 康	龚 斌
46	孟 郊	钟元凯
67	李 贺	陈允吉
99	贾 岛	胡中行
121	唐 寅	邵毅平
142	徐 渭	贺圣遂
165	金圣叹	王 群
188	郑板桥	鄢国平
210	苏曼殊	朱文华

阮 籍

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。
薄帷鉴明月，清风吹我襟。
孤鸿号外野，翔鸟鸣北林。
徘徊将何见，忧思独伤心。

这是阮籍五言《咏怀》诗八十二首中的第一首，诗中的形象具有象征意义。主人公夜间久久不能入睡，起床独坐在空荡荡的堂上，弹琴遣怀。惨白的月光透过薄薄的帷幕飘洒在他的周围，寒凉的夜气阵阵吹袭，拂动着他的衣襟。一种凄清而伤感的气氛笼罩着一切，也渗透了人心。寂寞枯索之中，传来一声声悲鸣，那是野外失群的孤

雁在呼唤伴侣，林中惊惶的飞鸟在寻找归宿。环顾四周，这个冷漠的世界上看不到任何令人慰藉的东西，心中只有无穷无尽的忧伤。无疑，诗中描摹的并非实在场景，也未必隐喻着什么具体的事实，而只是借诗的意境，寄托一种绝对的孤独之感，一种幽深而难以名状的愁绪；进而言之，这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悲哀，同时也反映出那一时代许多士人的共同心理。

这里需要对历史作一简单回顾。汉武帝时代，董仲舒等人杂揉各家学说，建立了一种富有宗教气息的新儒学——即今文经学，作为汉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。在这个理论体系中，现世的统治秩序被解释为有意志的“天”的安排，而这个统治秩序又通过一整套礼法制度来维持。礼法的核心是伦理要求，同时还根据各人身份地位的不同，确定他们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所应遵循的准则。延而至于东汉，古文经学盛行，把“微言大义”改为“章句之学”，但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强调愈甚于西汉。总之，这是一套与专制政治相适应、强调个人对皇权、对社会的依附性，而否认个人自身的价值与个人自由的规范。至东汉中期以后，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士族力量开始兴起，经汉末战乱，愈加膨胀。正因为士族并非是完全依附于皇权而存在的，他们也就难以完全接受以

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为旨归的汉代经学。因而，一种新的思潮首先在士族中产生，并逐渐延漫于整个上层社会。这一思潮的基本特征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：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被视为最高和最真实的存在，个人的情感和自由意志受到充分的重视，自我价值的实现被视为人生的根本目标。反映在哲学领域，是老庄思想及以此为基础的玄学的抬头；反映在文学领域，是以人生为主题的创作的兴盛。

但现状对士族文人绝非是乐观的。汉、魏、晋在短短几十年中迭相更替，一次又一次严酷的权力斗争卷起无数险恶的政治漩涡，而士族并不能完全保持独立地位，也无法逃避权力斗争的风波。甚至，就是早已显现出其荒谬与虚伪的传统礼法，也依然一次又一次被新的权势者抬出来，作为压制反对派的根据。曹操可以算是最为不拘陈规的政治家，他杀异己分子孔融，却是用“不孝”的罪名。至于司马懿父子，更是专讲礼法，而杀人尤多。时代已经是清醒而富于理性的时代，人已经是重视个性、追求自由的人，但他们无法抵抗外部力量的控制，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。哪里有真诚的、尊严的、自由的生活？连人命都是朝不保夕。他们不能不为此而悲伤，并由此引起对于人生的充满痛苦的思考。这一趋向在曹植以

及阮籍之父阮瑀的诗中已见端倪，到了阮籍，由于他的特殊环境和经历，由于他那强烈而敏感的性格，而发展到更为深入、更为淋漓尽致的境地。

阮籍，字嗣宗，陈留尉氏（今河南尉氏县）人。因为他做过步兵校尉，时人又称之为阮步兵。阮籍的父亲阮瑀是曹操的重要幕僚，擅长诗文，代曹操起草过许多军国文书，是著名的“建安七子”之一。阮氏再上代的情况就不太清楚，但显然属于有一定地位的家庭。从阮瑀这一代开始，宗族中有不少人出任重要官职。阮籍出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（公元210年），三岁时，父亲就去世了，他是由母亲抚养大的，所以对母亲始终抱有很深的感情。《晋书》本传中说他“性至孝”，还记载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故事：一次在大将军司马昭府中，有人报告了一桩儿子杀害母亲的案件，阮籍在旁脱口而出：“嘻！杀父乃可，至杀母乎？”这话引起司马昭以及周围人的责难，阮籍只好巧言解说：“禽兽知母而不知父，杀父，禽兽之类也；杀母，禽兽之不若。”无论怎么说，在阮籍心目中，父亲的地位是远不能与母亲相提并论的。由于他从小就没有严父的拘束，只是在温馨的母爱中长大，而且总不免常常依恋于这气氛，因而更容易养成敏感、放任和多少有些软弱的性格。

关于阮籍早年生活的情况，记载很少。据说他自幼聪慧，八岁就能写作。年轻时代，他曾有过一段放浪不羁的经历。《咏怀》诗自称“少年学击剑”，这是类似游侠的行径。又说：“平生少年时，轻薄好弦歌。西游咸阳中，赵李相经过。”（“赵”、“李”也是指游侠一类人物。）这种生活经历除了个人的因素外，也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。魏晋时贵族子弟追慕奢华，轻狂放浪，恃气任侠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。他们没有必要象汉代的儒生那样循规蹈矩，埋首经籍，可怜巴巴地求取功名；他们生来就是社会的特殊成员，家族的势力是他们获取政治权力的凭依，因而飞扬跋扈、纵恣任诞，算不得在德行上有什么了不起的亏缺，甚至相反，常常为他人所称道和羡慕。自然，游侠式的生活终究只是阮籍年轻时代热情与浪漫的表现，到了一定的年岁，便羞为此道了。但旷放自适的生活态度，却并无根本改变。史传中说他“或闭户视书，累月不出；或登山临水，经日忘归，”大约是壮岁以后的情状。

任情不羁，只是阮籍早年生活的一方面。以他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的聪慧警敏，必然会对自我的未来抱有远大的期待。《咏怀》诗中自述道：“昔年十四五，志尚好《诗》、《书》。”这是以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泛指儒家经典。虽说在阮籍的时代，严重

束缚个性的汉代经学已经不为士人所重，但传统的儒家经典仍是他们必习的课目。尤其是个人向往在社会中有所作为时，仍然需要从这些经典中寻找思想和行为的依据。《咏怀》诗又回忆自己早年的志向，说是“颜闵相与期。”（颜、闵即孔门高足颜回和闵子骞。）正表明他想要在德行上有所建树，成为受后人崇仰的贤者。此外，史传中也说阮籍“本有济世志”。这些都反映了阮籍不甘寂寞、追求功名事业的愿望。放旷任性与尚德济世看似格格不入，但在阮籍他们身上却是奇妙的统一：任情自适，是重视个性自由和个人情感的表现；追求功名，也是为了在社会中实现自我的价值。虽然由于后来的经历，《咏怀》诗对人生基本上都持悲观态度，但第三十九首，却例外地抒发了慷慨豪壮的情怀，颇类于建安诗的风调，这也许是诗人少年之志的偶一闪现吧：

壮志何慷慨，志欲威八荒。驱车远行役，受命
念自忘。良弓挟乌号，明月有精光。临难不顾生，
身死魂飞扬。岂学全躯士？效命争战场。忠为百世
荣，义使令名彰。垂声谢后世，气节故有常。

只是命运不肯赐与阮籍实现其夙愿的机会。在他度过青年时代之后，政局就在酝酿着剧烈的变化。阮籍十一岁那年（公元220年），曹丕取代汉室，建立魏朝。但不到三十年，经明帝曹叡至

曹芳，便已大权旁落。曹芳继位时年岁尚幼，由宗室曹爽与大臣司马懿共辅朝政。后来二人争夺权力，矛盾日益激化。曹爽身为宗室，原本占有优势，但他骄横刚愎，并无实际才干；司马懿却是老谋深算，有足够的耐心和胆识。到了正始九年（公元248年），司马懿终于抓住机会，果断发动政变，取得成功，随后诛杀曹爽。自此，以司马一姓取代曹魏政权的计划就在有力地推行着。

阮籍就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开始踏上政治舞台。齐王曹芳正始三年（公元242年），他三十三岁，已是名满天下。当年新任太尉的蒋济听说他的才能，下命召辟他为太尉掾属。按当时制度，朝廷的少数最高级官员（如三公、大将军等）有权成立自己的府署，并自择僚属。一般的习惯，总是选择在士林中享有声望的人入府，以扩大自己的影响。因而这一种召辟，成为文人的主要出身途径之一。阮籍开始不愿就职，后来勉强去了，不久即以病为由，辞官还乡。继而又做过很短时间的尚书郎，也是称病而归。到正始八年（公元247年），大将军曹爽又召他为参军。当时曹爽正贵盛无比，作为大将军参军，阮籍可以说得到了接近最高权力中心的机会。但他仍然以疾病为由，很快屏退乡里。阮籍一再辞官，并不是他改变了初衷。开始几次，可能是因为机缘不合，所以无

意久留。而辞官隐退，也是有影响有地位的士人自重身份、待价而沽的手段。但到后来，尤其是退出曹爽的大将军府一举，则显然是因为他看到了政局的危险，不愿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。果然，就在他辞官一年多后，曹爽败于司马懿之手。对于阮籍明察时变、及早脱身避祸的举动，当时人都佩服他有远识。不过，从阮籍自己来说，未免有惊心动魄之感吧。随着上层权力斗争愈来愈酷烈，他的政治雄心也愈来愈衰退。

大致就在正始八年以前的一段时间中，阮籍一度与嵇康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王戎、阮咸同居山阳，常游于竹林之下，放达任酒，畅言老庄之旨。这就是著名的“竹林七贤”。他们有萧散清朗的风采，旷达超脱的襟怀，机智玄妙的辩才，无不吐言成珠，下笔琳琅，占尽一代风流，引起后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叹赏和追慕。不过这些当代的名士在此结世外之游，并不完全是出于思辩的热情，尽管衷怀不尽相同，但以隐避祸，在林间山中静观动向不明的政治漩涡，等待时局的变化，却是一致的。一旦到司马懿政变成功后，局势明朗，七人也就分道扬镳。其中山涛由于同司马氏的亲戚关系，很快成为新贵；王戎在隔了若干年之后，步随山涛的后尘；嵇康本是魏宗室之婿，更且生性刚烈，高傲不羁，因而走上反对司

马氏的道路；阮籍呢，却陷入到一种进退两难、身不由己的境地中。

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，司马氏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努力。首先是以暴力剪除反对力量。在这方面，他们十分清楚围绕着最高权力的斗争必然是残酷无情的，决不顾忌使用任何狠辣的手段。司马懿杀曹爽时，将其同党一律夷灭三族，株连无数。许多著名文人因此丧生，有“名士减半”之叹。另一方面，司马氏集团也需要笼络人心，尤其是拉拢那些在士林中有影响的人物。阮氏是一个与曹魏政权有密切关系的大族，阮籍本人是当代受人敬重的才俊之士，他自然成为司马氏物色的对象。大约在嘉平二年(公元250年)，司马懿夺政不久，就征召阮籍为其太傅府从事中郎。次年，司马懿去世，其子司马师以大将军执政，阮籍又转为大将军府从事中郎。此后发生了反对派大臣密谋夺权而告失败的事件，大批牵涉此案的官员均被夷灭三族，继而皇帝曹芳也先被废后遭戮，恐怖的气氛日益浓重。新皇帝曹髦即位之际，司马师假借名义封赏群臣，阮籍也封爵关内侯，并被授予散骑常侍这一品位颇高的荣誉官衔。正元二年(公元255年)，司马师去世，其弟司马昭继以大将军执政，阮籍再度转为司马昭的大将军从事中郎。这时，改朝换代已在眼前。尽管司马